

实践科学观的存在论意蕴及其特征

周丽昀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目前已有的关于实践科学观的研究仅停留在认识论层面,不能很好地理解科学的本质。更根本的是挖掘实践科学观的存在论意蕴。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向度为这一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实践的科学观看来,科学是在一个由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动态网络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并处于生成和流变之中的开放的体系。对科学的认识一直“在途中”。实践科学观具有与境性、主体间性、历史性和反思性等特征。

关键词: 科学观;实践;存在论;与境;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03 - 0007 - 04

在科学观领域,向来存在许许多多激烈的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的争论,它们基本上代表了争论最为激烈的两方。当然,科学观领域的争论远不止这些。诸如科尔的“实在论的建构论”、罗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所罗蒙的“社会经验论”、莫兰的“自觉的科学”、齐曼的“真科学”等,都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人的思考。特别是自从“科学大战”以来,各种各样的科学观也都渐次浮出水面,论证激烈。那么,面对这种种科学观,我们该何去何从?又如何评价这些理论呢?它们孰优孰劣?哪一个更接近科学的本质?

仔细研究下来,我们发现所有的理论几乎都是有价值、有启发的,但又不完美的。以至于后来有人主张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要更加重视科学的实际活动过程(process),而不是科学的结果(result)。这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将科学作为“实践”而不是“表象”的概念。至此可以说,实践科学观的概念开始初露端倪。但是,国外以及国内的很多研究者仅仅将研究停留在认识论层面,就此止步不前。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足以理解各种科学观何以能够层出不穷,长期共存,也不能更好地接近对科学的本质理解。只有挖掘出实践的存在论意蕴,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种科学观的理论价值和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无疑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一 实践科学观的存在论意蕴

通常情况下,实践首先是一个认识论概念,是与纯粹的理论相对的概念。但更根本的,实践还是一个本体论概念,是比“文化”概念范围还要宽广的概念,是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基础和源泉。鉴于以往的研究过多地考虑实践概念的认识论向度,而忽视了其存在论层面的意义,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就不妨多费笔墨来说一下本体论,或者说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然后再理解所谓的实践科学观。这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这儿讲的实践,更多地是奠定在维特根斯坦以及马克思的实践观之上的。

1. 实践观的存在论向度

维特根斯坦非常强调实践的作用,特别是语言实践。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基于一种生活方式。为了描述这种语言现象,我们就必须描述任何一种实践,但不是孤立的事件。”^[1]可见,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语言游戏就是整个语言实践,在这里,实践不是与理论平等相处的对子,而是包括理论、思维、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等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的基础和根据。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生活形式,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马克思也曾谈到过语言实践,他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

【收稿日期】 2004 - 12 - 19

【作者简介】 周丽昀(1972 -),女,山东淄博人,讲师,哲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哲学、科技与社会。

需要才产生的。^[42]语言从人类生活的实践中产生,也应该从人类的生活实践中加以理解。比较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实践观,无疑对我们理解实践颇有帮助。鲁宾斯坦在《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一书中指出:“由于把意义看作社会实践的性质,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决定性地与传统决裂。”^[43]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暗示,对于整个社会实践系统有完整的理解的必要,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在这方面有重要的优越地位。^[44]由此可见,从生活形式,或者从人类的实践去理解人们行为的意义,是哲学方法论的一个转变。语言实践是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存在的,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基础,这无疑是从存在论角度阐释实践的理论典范。

许多马克思的研究者,在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重新解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挖掘出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向度。比如,何中华先生认为,“实践首先是被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确立起来,把它理解为人的存在的现实表征和确证。”^[45]只有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因为它包容了人的存在的一切可能的维度,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等等一系列矛盾和分裂,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拆解性特征。因此,作为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实践超越了自在世界的预成性和封闭性,以其生成性和开放性标志着自身的特质。无独有偶,吴晓明先生也认为,当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6]时,“其意义首先就在于(当然不止与此)决定性地超出知识论的路向,亦即决定性地超出为概念、逻辑和反思所支配和统治的世界。”^[47]只有从超越知识论的生存论的角度,把事实、现实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才能在实践这种“对象性活动”中领会对象性关系——即崭露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实践活动的这种存在论基础使得“人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界作为人的存在”的实在性得以彰显。

即便在科学观领域,我们也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实践的存在论意义的深刻根基。在马克思那里,有两段关于真理表述的名言。其中一句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8]另一句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9]马克思的这些话对解决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问题揭示了一条崭新的思路,那就是实践所提供的广阔视角和深刻内涵以及整体向度,使得回归实践或回归生活世界不仅成为许多科学工作者的明智选择,更成为当今哲学的一种普遍趋向。正是实践使人们从种种乌托邦和思辨的批判中解脱出来,真正回到了现实,回到了人的存在本身,“它是‘无’,却又是万有之源;它超越了存在,却又不在存在以外。”^[10]藉此人类才可以以有限的存在去追求无限,真正达到澄明之境。

2. 实践科学观是理解科学的新途径

实践科学观是与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和预设主义基础上的表象科学观相对而言的。在表象科学观的框架下,科学就是认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表象,不管是将真理

归于“自然实在”一极还是“社会实在”一极,都是将一切的一切对象化的结果。这种科学观预设了科学的本质,然后又想在其理论和对世界的认识之间寻求两极的相符。表象主义的科学观虽然也曾为科学的成功作出解释、说明和辩护,但是,因为没有有一个先定的存在对其相符性作出判断,因此两者之间的鸿沟自然也就无法弥合。

面对表象主义科学观遭遇到的种种困境,我们需要转换思路,重新考量一下我们的科学观。“现在,科学家、科学使用者和科学观察者都比以往更需要‘科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科学究竟能干什么’的一个清晰画面。”^[11]如此一来,科学不再被看作是客观世界的表象,而是一系列实践过程的集合,科学不再是既定的或者确定的东西,而是一直在途中。与之相关,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对这样一种科学实践的研究与其说是科学或哲学中的知识论问题,倒不如说是与科学家、人文学者以及所有科学研究者密切相关的存在论问题。恰如塞蒂纳所言:“我们既可以把外界锁定在主体之内,也可以把环境锁定在主体之外。现在,让我们假定我们既不是开始于主体,也不是开始于客体,而是开始于……科学实践的概念。”^[12]毋庸讳言,正是实践概念的引入,才使我们摆脱了纯粹思辨的束缚,使科学观进入一个更广阔、更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

就实践科学观的发展来说,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从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在70年代,科学哲学经历了从描述性和规范性的分界到内史论和外史论的分界的转变;在80年代,理性和相对主义的争论则比较突出;到了90年代,则主要经历了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13]此后,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得到来自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全方位的研究。

但是,科学中的“实践”概念也是不断发展的。起初,这种方法的独特性停留在直接观察在当代知识系统中的应用。塞蒂纳在其1999年的著作《认识文化》中明确指出,将实践作为组织主题的知识研究虽然有着广泛的区别,但是却有一种共同的关注,就是“将当代科学看作在当代的背景,例如科学实验室中产生的”^[14]。Alvarez也指出,“对与境二分的拒斥,以及对辩护和SSK引起的知识的产生之间的优先权的逆转,使得实验成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15]后来,“作为实践的科学”突破了仅仅被等同于“实验”的命运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实践是概念网络为了适应新环境的一种创造性扩展。”^[16]“将实践描述为开放的和有益关系的至多只是抓住了其表面特征。”^[17]更多的学者对科学研究中的实践转向进行了解释,如Ian Hacking、Karin Cetina、David Gooding、Adam Stephanides以及Joan Fujimura等人。^[18]事实上,无论是实在论者,还是建构论者,还是不明显属于其中任何一派的科学研究者,都逐渐认识到原有的与境二分的思维框架的局限,更加注重“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而不是行动的结果。所有这些探索,都使得科学中的“实践”具有了几乎可以与“文化”相提并论的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特征,并因此成为理解科学的新途径。这是一种思维框架的转变,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式。

无论是从逻辑的、还是历史的向度,我们都不难发现,原先那种将科学作为概念和理论的表现科学观已经不能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需要代之以一种新的实践科学观。这种科学观除却认识意义以外,更多地还带有存在论的色彩。在实践的科学观看来,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方式,是在实践中,在一个由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动态网络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并处于生成和流变之中的开放的体系。科学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向未来敞开。对科学的本质和形象的认识也会有各种可能性,而对科学的解释本身也是具有可塑性的。对科学的认识一直“在途中”,在科学自身的发展中。其中,各种观点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些科学理论与科学研究理论之间的争鸣,加上许许多多的社会因素一起,作为“合力”,共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在这种有张力的批判和建设,科学与其他文化相比,依然不失其独特性和可靠性。所有这些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框架都将会成为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资源,以便达到对科学的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 实践科学观的特征

实践科学观是对表象科学观的超越,也是一个有着广阔视角和深刻内涵的研究领域。综观实践科学观,我们可以发现其如下特征:

1. 与境性

“与境”英文为“context”,指的是事物的一种前后联系和内在关联。在科学哲学中,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者使用这个概念,用来指代科学的当地性、情境性和偶然性,以及科学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产生的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科学的与境性反映了现代科学反对抽象、走向具体的一般趋势,开始回归生活世界,关注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关的东西;并且不再用一种抽象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是把具体事物放置到具体的情境中来看待。塞蒂纳曾指出科学方法与其他社会形式并无不同,“为了还原科学的与境性,我们曾不得不走进实验室,并且观察知识生产的过程。……科学方法是与境孕育的,而不是无与境的。而且,它正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也可以被视为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19]因为,“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受到不能被彻底冲洗掉的未经雕琢的生活世界‘杂质’的影响。”^[20]生活世界在其多重性、多样性和异质性上是无穷无尽的,生活世界知识具体结合了感知、认知、意图、主体间性、个人间的合作以及个人和群体生活等其他许多特征,所以对这些具体情境要进行详细审查。罗蒂认为,“在比较真的事物和仅仅得到了辩护的事物的过程中,惟一的关键是可能的未来和实际的当下的比较。”^[21]怀特海对此的建议是,“我们应该从实体思维转向事件思维”^[22],因为当我们根据事件来思维时,我们就会承认,一些现实情境乃是各种关系的综合,而且不能脱离这些关系而存在。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特定的实践活动,以及特定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2. 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20世纪哲学中极为凸显的一个概念,其英文是intersubjectivity。《简明哲学百科词典》把intersubjectivity译为“主体间关系体”,并解释为“表征自我与我他关系的现象学概念”^[23]。从哲学史来看,早就有主体间性思想的萌芽。先是康德提出了先验图式,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得需要主体之间有一种共同接受的知识,它是不被怀疑的,并以共同接受的知识为基础去整理经验材料,由此获得客观性的知识。先验图式表明主体间具有一定的共同的性质,即主体间性,康德以此来表示普遍有效性概念。后来,彭加勒的“约定论”指出,科学定律之所以被认为是“真”,取决于科学家们的约定。可见,彭加勒所谓科学定律的“真”,实际上就是主体间性。维特根斯坦则从语言角度展开对主体间性的讨论,他认为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语言活动是一种生活形式,它一定建立在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的基础上。库恩从范式角度研究了科学家之间存在的关系,范式的概念表明,科学家之间具有的主体间性,既是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同时又受到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此后,更一般地讨论主体间性是现象学和解释学。胡塞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主体间性的概念。

但是,通过以上对主体间性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1)他们对主体间性的理解依然是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不能真正解释语言和意义等。(2)他们认为主体间性并非与客观性水火不容,相反,“主体间性既是客观性的条件,又是客观性的基础。没有主体间性就不可能有客观性。……客观性包括了主体间性。当主体间性成为科学理论的一个因素,当科学理论与科学事实成为一个自治的系统时,主体间性就获得其客观性,从这一意义上讲,主体间性就是一种客观性。”^[24]

在科学哲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主体间性在科学中的贡献举足轻重,甚至是科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莫兰指出,“主体间的相互批评是客观性概念的关键性的关节点。”^[25]在主体间关系和客观性之间存在着特别的联系。^[26]这再一次表明人们以为可以消除人类的主体,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正是主体间性使得个别学者的观点被验证和认可,由此获得普遍性和客观性。因此,科学活动的主体间性一方面依赖于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依赖于所有这些观察者,而具有某种超然物外的性质。这一点只有将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才可以理解。总之,科学活动的主体间性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向:“对世界的认识,对客观性的认识,要返回自我,返回生活,返回实践,返回到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相统一的实践生活世界中去。”^[27]

3. 历史性

我们既然已经理解了科学活动的与境性和主体间性,就很容易理解科学活动的历史性特征。这种历史性首先体现在科学活动的变动性。科学不仅是已有的知识体系,也是人类不断探求知识的创造性活动。科学活动是整个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孤立地自主地发展着,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科学理论、科学事实、科学实验及其

彼此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在科学的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交织中,科学的与境并不是确定不易的,而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迁。

科学活动的历史性的第二个表现是科学活动的生成性。“世界从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東西、某种生成着的東西。”^[28]科学作为对世界的一种反映和看法,自然也不例外。“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忙于修改人们所持有的世界图式,在它看来这种图式永远只是暂时性的。”^[29]因此,受困于种种生活形式和思维框架之中的我们也不能过于信赖科学当前的形式。“科学不是一种固定的文化活动。通过改变社会,它也改变着自己的本质。”^[30]科学的实践活动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包含对自身的辩护。正是批判与辩护的统一,使我们不至于简单地认可,并委身于一种既成的情境,而是不断地重构它们。并且,这种重新与境化推动了科学传播,也带来了知识的扩展,成为科学变化的一部分。

这让我们想起了常用来解释历史规律的“合力”原理:“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31]这就意味着,个别有目的的活动导致整体的出乎意料的结果。在历史中,个人意志的合力使得历史不断规律性地前进,在科学中,各种各样因素的汇集也使得一切处于生灭变化中,使得真理呈现一种不断生成的开放状态,不可能在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结束。人类“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际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32]

4. 反思性

实践的科学观是一种具有反思性的科学观。这种反思性的研究思路是相对于对象性研究思路而言的,主要表现在,我们在进行科学实践,生产科学产品的同时,也在反思这些行为的合理性,并进而实现自我调整、自我校正以及自我完善和发展。

那么,如何来理解“反思性”?实践的科学观又是如何可能实现这种反思的呢?

“反思”一词黑格尔用得最多。黑格尔认为:“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33]。在黑格尔看来,正是这种对事物的反思,才使哲学有别于其他具体认识活动。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实体即是主体”,由于他将一切都置于绝对理念的体系之中,所以最终陷入一个封闭的怪圈,其反思性也只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思辨。以后的很多学者,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式理应是对象性的,而不是反思性的,只有哲学才是反思的学问。笔者觉得这些观点都是有局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没有将科学作为一种实践,而是作为一种理论或者概念体系来看。“其实,作为实践的科学并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或与认识相割裂的本体。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它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因而本身就具有反

思性。”^[34]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实践的科学也是运用反思性思维方式来理解科学,从事科学活动的。“对科学认识的认识必然包含着一个反思的方面。这个反思的方面不必再诉诸哲学,……它应该来自科学世界的内部。”^[35]这种反思主要表现在对“元科学”的讨论。我们也许会提这样的问题:“我们曾经有过并且现在拥有哪些科学,我们可以得到哪些科学,我们能够或者应当要哪些科学。”^[36]此时我们已经不自觉地转换了看待科学的视角,开始回到科学的本源性问题上来,它掌握更加丰富、更加广阔的元观点以便科学地考察科学本身,使科学永远处于探索之中。另外,科学的反思还意味着“自知其无知”。所有这些都不但要求其他学科对科学进行反思,还要求科学自身进行自我反思。这种反思的科学“应该和哲学的反思重新建立联系,同样地,由于缺乏供研磨用的经验知识的谷粒其磨盘在空转的哲学也应该和科学重新建立联系。科学也应该与政治和伦理的意识重新建立联系。”^[37]很显然,这些联系在旧的主客二分的科学认识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方式本身也需要科学地加以审视,这种联系只能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

以上,我们描绘了一幅新的实践科学观的图象。其中,各种各样的科学观可以平等争论,友好相处。它只是考察各种观点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从不打算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也不可能具有超历史的阿基米德点。“他只是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物、标准和争端,因为他知道任何观点都只能在历史视界之内。因而,任何标准都不可能具有先验绝对性,任何结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38]因为所有的实践探索都“在途中”。我们只有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保持自己是一个科学观领域的“异乡人”,既在其中,投身于热烈的研究和实践,又在其外,对一切理论保持一种友好和敬畏的态度。无需归一,也无需划定不必要的界限,我们相信所有这些理论和科学实践的“合力”的力量,它最终会通过科学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真正实现科学的自我认识和进步。

【参 考 文 献】

- [1][38]江怡. 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13、4~5.
- [2][6][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1、61、58~59、61.
- [3][4] David Rubinstein. Marx and Wittgenstei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206、204.
- [5]何中华. 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200.
- [7]吴晓明. 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J]. 学术月刊, 2001(9).
- [10]张世英. 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41.
- [11][20][英]约翰·齐曼. 真科学[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前言. 357.

- [12][19][奥]卡林·诺尔-塞蒂纳. 制造知识[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244~245、88.
- [13][15] Ambrogio Alvarez. Soci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twenty years of controversy[J]. *Phil & Tech* 1:3 - 4 Spring, 1996.
- [14] Knorr Cetina. Epistemic Culture: How the Science Make Knowledge[M]. Harvard College, 1999. 9.
- [16][17][18] Andrew Pickering (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4、5、8~14.
- [21][美] R·罗蒂. 后形而上学希望[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26.
- [22][美] J. B. 科布. 怀特海哲学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J]. 世界哲学, 2003(1).
- [23] 简明哲学百科词典[S].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90. 589~590.
- [24][27] 吴国林. 主体间性与客观性[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1(6).
- [25][26][35][37][法] 埃德加·莫兰. 复杂思想: 自觉的科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0、26、91、8~9.
- [28][31][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65、247、216.
- [29][英] F. A.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6.
- [30]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
- [33][德]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8.
- [34] 邱慧. 实践的科学观[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2).
- [36][美] 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11.

(责任编辑 殷 杰)